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2

2008年1月4日

改革總要有一個期限 — 鄧小平

楊毛¹

1986年9月，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將近十年，鄧小平告訴主持工作的領導，“改革總要有一個期限”；12月中旬又對他們說：“我們的改革到底要走幾步？多長時間完成？請你們研究一下。”顯然，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很清楚任何事情有始就有終，不可能無限期地進行。鄧小平把改革開放作為黨在一個時期的一個中心任務，會隨著社會的變化，條件的變化，黨會提出新的任務。不能把一個時期的任務作為一個始終不倒的旗幟，這樣會在時局發生變化時因為難以提出新的目標和任務而影響黨的事業不斷取得成績。

¹ 鄧小平 1986年9月13日在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彙報工作時的講話（〈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7頁）。

如果總結過去的經驗，會發現每當黨中央根據當時的形勢提出合適的任務，並且在任務基本完成後根據實際情況提出新的任務時，一切就比較順利，就能夠取得很大的成績並鞏固所取得的成果；如果在提出口號和任務完成後，沒有能夠及時提出新的任務，而是把已經完成的任務依然作為基本口號和路線，始終沒個完，就會失敗，甚至原來取得的成績也會喪失。

20世紀50年代初，黨中央把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要“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這個任務實際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於是毛澤東說：“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因此，在1956年開始，共產黨把建設一個強大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主要任務，社會主義建設接替了社會主義改造成為新時期的主要任務。

1958年，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作為“三面紅旗”，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思路，但是這個思路中，大躍進顯然對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基本任務是不合適的，明顯出了偏差。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即使大躍進已經不再實行，但我們依然堅持三面紅旗這個提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任何對大躍進的批評都會受到批判。

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按毛澤東的主張，文化大革命是解決反修防修的措施，任務是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臺，讓政權回到“堅持革命路線的人”手中。且不評論這個目標和任務是否合適，但1969年九大召開前，全國各省市各級單位基本完成了所謂“奪權”，這個任務應該算完成了。毛澤東也希望九大

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也就是結束文革。九大報告中承認：“全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標誌著這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決定性的勝利”。既然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任務應該是完成了，剩下點掃尾工作了。按中國共產黨的傳統習慣，這個時期應該提出新的任務，新的口號和目標。但是九大報告沒有這樣做，而是提出“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需要繼續前進，‘認真搞好鬥、批、改’，把上層建築領域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而所謂鬥批改，根本不足以成為一屆黨代會的基本任務，毛澤東自己對此所做的指示無非是：“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顯然，這些任務完全屬於“掃尾”工作，所謂鬥批改，該鬥的都鬥倒了，批也批臭了，毛澤東的指示顯然重點在於“改”。由於這個時候林彪還沒接班，四人幫還沒真正掌權，於是掃尾工作變成了主要工作，林彪在九大報告給出的任務是：“思想政治領域中的階級鬥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決不因為我們奪了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消失了。我們必須繼續……（接著是五個“批判”）……繼續……批倒批臭”。文革就不得不沿著“批”的道路繼續進行：誰說革命勝利了，現在該建設了，誰就挨批。要繼續革命，要不斷革命，必須堅持高舉文化革命的旗幟，文革成為一個沒完沒了的事情。

接著林彪喪命溫都爾汗，四人幫還一個勁兒地、不斷變換花樣地“批”。毛澤東這個時期說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過七、八年再來一次”雖然成為很多人詬病的言辭，但難道這句話沒有“已經實現了‘大治’，七八年後再來”的意思嗎？不是對不間斷文革的否定嗎？

毛澤東是個政治家，懂得一個事情有始就有終，沒有沒完沒了的事情。但是當所謂“堅持革命路線的人”其實是一群陰謀家，他們只有讓這個事情沒完沒了才能渾水摸魚的時候，毛澤東已經無能為力了。於是文革搞了十年，最後被強行制止。

回頭看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29年了，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長的一個“任務”。我們把鄧小平當時提出的一項有步驟、有期限的任務，變成了“歷史新時期”、“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和“偉大事業”。改革既然成為一個“事業”，自然成了中國共產黨實現共產主義前的全部活動了。

可惜，改革、開放顯然不具備“事業”特性，只具備“任務”特性。改革是對舊體制的改動、修正，可以“創新無限”，但沒辦法“修改無限”。開放也是這樣，開放是對封閉而言，就像脫衣服，一件一件脫，總有個脫得沒什麼可脫的時候。

嚴格來講，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的任務就基本結束了。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完全不存在，所有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都處在市場競爭中，資源已經完全由市場配置。按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根本找不到什麼可以改的對象了。也可以說，也到了宣佈改革開放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了。

但是我們沒這樣做，一些人把目標盯在國有企業上，把“產權明晰化”這個本來不是市場經濟的規則，或者說只是一派西方經濟學者的理論作為改革的依據，開始了一場“繼續革命”的活動。其實，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資源配置主體究竟是依據供求關係

的市場還是別的，根本對進入市場的主體究竟是個人、團體還是國家沒有要求。西方國家的國有經濟成份有的也很高，英國工黨時期最高也達到 30%，西方經濟理論對國有經濟到底佔多大成份也是處於爭論狀態。但是我們連鬥~批~改的步驟都沒進行，而是走了改~鬥~批道路。1997 年後什麼邏輯也不說，就把五千多萬國有企業職工鬥下崗了，讓幾十萬國有、集體企業“改制”了，做都做完了才有個什麼“冰棍理論”來批。即使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是合適的，但這已經與“改革”無關，因為這與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改革的任務無關，這只能叫“創新”。

同時開始的教育、醫療“改革”也明顯具備“創新”的特點而不具備“改革”的屬性。20 世紀以前，全世界的教育、衛生本來都處於“市場”狀態，政府都很少干預他們。但衛生、教育有明顯的“公共事務”特性，20 世紀初以來全世界無論發達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把教育和衛生用非市場渠道進行資源配置，政府對衛生和教育的干預程度大大加強，很多國家的衛生和教育資源幾乎全部由國家調配，這才是歷史趨勢，是現代化的基本走向。但是我們走了一條與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這只能叫“創新”，不叫改革，因為改革的目標是“現代化”。

而開放這個任務，其實早在改革前就基本完成了。開放對中國來講，就是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西方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和世界進出口總額急速上昇帶來的機會，實現持續的高速增長。西方國家在進入虛擬經濟以後，表現出產業空洞化的趨勢，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以來，產業資本以直接投資方式向發展中國家以加速度轉移，從 1990 年的 369 億美元增加到 2003 年的 2525 億美元。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不像西方國家之間的併購，而是以建廠方式對製造業投資，這為發展中

國家加速工業化提供了機會。同時，西方國家產業空洞化意味著世界貿易將激增，世界進出口總額從 1990 年的 3.9 萬億美元提高到 2004 年的 18.5 萬億美元。哪個發展中國家能夠最大限度吸收這些產業資本，哪個國家就有經濟起飛的機會。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次西方國家產業資本轉移是以企業直接投資方式，而不是政府貸款方式進行的，不具備吸收這些資本的國家只有那些與美國處於直接對峙的、受到美國經濟制裁的國家。就這個條件來講，中國在 1972 年後就具備了吸收西方工業國直接投資的條件。同時我們必須區分“封閉”與“封鎖”，在 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中國一直尋求與所有國家建立正常關係，是東西對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封鎖造成了中國開放程度不足。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中國已經實現對外開放，包括進口大型設備到吸收國外貸款都勁頭十足。而用特區方式吸收國外直接投資，早在 70 年代周恩來總理就指示研究了。80 年代宣佈對外開放，更多的是姿態而不是實質。起碼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中國還有什麼要“開放”的呢？

那麼，繼續把改革開放作為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旗幟和事業有什麼不好呢？該做的照樣做不就行了嗎？

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嚴重的貧富分化，低收入群體的擴大將嚴重影響中國內需的增長；同時，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保障和教育、衛生體系被打破而新的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也就是說中國當時的任務是避免貧富分化現象出現，建立新的勞動保障機制和公共教育、醫療體系。

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手段恰好不是用市場經濟“看不見的

手”，而是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無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西方國家都是一樣的，都是完全的“計劃”手段，是政府干預。如果還把“完善市場經濟”、“減少政府干預”作為主打口號，不僅理論上說不清楚，造成思想混亂，而且已經基本西化的主流理論界一定會唱反調。這個時期如果宣佈改革開放勝利結束，宣佈中國進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階段，把十六大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指導思想，則與要完成的任務完全匹配。

但是當時我們沒有意識到當時的任務究竟是什麼。

十六大後，問題明顯暴露了，中央及時提出了要建設和諧社會，要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改革開放”，試圖解決貧富分化嚴重，兩極分化加劇，包括糾正教育、衛生改革中的問題。但是，這個任務顯然並不能用“市場化”和“減少政府干預”等改革初期的理論所支持，於是形成對改革進行“反思”的思潮。甚至形成主流理論界不斷質疑中央的提法的情況，去論證究竟“小康社會”重要還是“和諧社會”重要，論證貧富分化並不嚴重，論證富人還不夠富是窮人窮的原因，論證高學費有利於窮人等，並在中央所有利民措施上唱反調（比如春運不提價、政府控制房價等）。而對解決當前問題感覺失望的群體，開始以懷念毛澤東的方式來表達。這說明由於實際任務與指導思想不匹配，不利於對實際任務的解決，也不會得到任何群體支持。

最主要的是，中國真正面臨的危機，所有情勢都是要求在金融體制上與國際接軌，而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甚至包括日本在內，都在接軌後發生了金融危機，並墮入經濟危機、社會動蕩的泥潭。只要繼續打著改革開放的旗幟，中國一定無法避免不走這條路。而這條路的終點，現在看也就是三、四年的光景了。

如果有人建議中國共產黨現在宣佈“改革開放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現在宣佈勝利結束”，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如果接著的話是“新時期的目標是建設一個以科學發展觀做指導，以和諧社會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不讓人覺得意外了。